

“非典型”的革命主体

——战时工业视域下的路翎小说

路 杨

【摘 要】在抗战时期大规模的工业内迁以及西南内地战时工业建设的语境中,观察与书写西南矿区工人的生活与命运,成为了路翎四十年代重要的小说创作领域。与三十年代书写城市工人革命的左翼文学模式相比,路翎四十年代小说中有所争议的劳动者形象不仅包孕着一种非典型的革命主体诞生的可能,揭示出“工人阶级”这一政治主体想象内在的复杂性与现实性,更显示出四十年代的战争经验尤其是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对于工农群体的内部构成、经验方式及主体意识的重构。

【关键词】路翎;工人形象;革命主体;战时工业内迁

【作者简介】路杨,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北京 100081)。

【原文出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成都),2019.11.207~213

自1938年举家入川至1946年迁回南京,路翎四十年代的个人生活与短篇小说创作一直和“煤矿”有着密切的关联。路翎18岁即经继父介绍,先后在重庆北碚的国民党经济部矿冶研究所与燃料管理委员会做办事员,期间常去造访附近的后峰岩煤矿,不仅下过矿井,访问过矿工宿舍,还观察过工人乱葬坑。1946年底,路翎因继父的工作关系在燃料管理委员会的南京办事处谋得生计,在给胡风的信中,路翎自嘲道:“当成公务员了,而且又是‘煤炭’。真是命里注定的样子”^{[1](P.137)}。无论是在文学经验的积累还是文学空间的垦殖上,战争中的矿区生活都为路翎四十年代的写作提供了丰厚而又不可多得的资源。在抗战时期大规模的工业内迁以及西南内地战时工业建设的语境中,观察与书写西南矿区工人的生活与命运,成为了路翎一度奋力开掘并被寄予厚望的文学领域。1941年8月,身在香港的胡风在给路翎的书信中不无激动地写道:“你对于劳动人物的追求将带你到一个远大的前途。”^{[2](P.13)}并在1942年为《饥饿的郭素娥》所做的序言中谈到,在路翎创造的一系列文学形象中,“最多的而且最特色的却是在劳动世界里面受着锤炼的,以及被命运鞭打到了这劳动世界

的周围来的,形形色色的男女”^{[3](P.3)}。然而在胡绳、向林冰等批评者那里,路翎笔下的底层劳动者形象则受到了质疑与批评。胡绳曾专门撰文指出,路翎小说中的很多主人公“在外形上是工人却有着——我们只能说——一颗不是工人的心”,“其主观意图虽然是寻找存在于人民群众中的力量,发扬人民的英雄主义,但实际上,他所看到的人民力量不是从现实生活中产生,倒是建立在与现实生活无干的突发的情感波动之上,也不是在集体的群众中产生,倒是建立在离开群众的独立特行的个别人物身上”^[4]。但在七月派同人阿垅看来,路翎重视人物心理与精神状态的作文方法恰恰是以一种形象化的思想与批判方式“依靠了和表现了人民的力量”,胡绳的批评只是一种教条化的“理论八股”^[5]。这一批评论争的焦点正在于:路翎小说中的底层劳动者形象能否被视为一种具有现实性与典型性的革命主体呢?

一、工人的知识分子化与“语言奴役创伤”

如果说,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传统中的底层人物大多是“辛苦麻木”、被“内在地压碎在旧社会里”^{[1](P.45)},那么路翎的小说则恰恰是在底层劳动者身上发现了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正如胡风在为

《饥饿的郭素娥》所做的序言中所说：“在路翎君这里，新文学里面原已存在了的某些人物得到了不同的面貌，而现实人生早已向新文学要求分配坐位的另一些人物，终于带着活的意欲登场了。”^{[3](P.11)}与胡风所反抗的公式主义的左翼文学中沦为革命教义或作家理念传声筒的工农形象不同，与赵树理笔下那些明朗单纯的扁形人物也不同，路翎笔下的劳动者形象常常包裹在大段的思想独白或有关其精神世界的描述性独白之中，表现为一种具有鲜活面目、强烈个性以及不断变化的自我意识的个体/主体形象。在小说《何绍德被捕了》中，作为一个带有流浪汉气质的工人，何绍德的精神世界充满了丰富而强烈的情感和欲求：

何绍德比一切这样的人在灵魂里有着更多的愤怒，他孤独、悲凉，世界在他眼前展开，他带着光辉的年青在这世界上行走，然而总是什么东西压迫着他，使他不能满足他的欲求，使他痛苦，他所要求的东西是多么不容易得到啊，现在是，又回到贫苦的黑色的生活里来了，贫苦首先使他的愤恨燃烧。^[6]

正如舒允中所观察的那样，在这样大段的描述性独白中，路翎不惜“不断地打破人物塑造方面的真实性原则并且还进一步用第三人称叙述人的强烈声音破坏自己作品中的现实主义氛围”^{[7](P.120)}。而继之而来的问题正是胡绳在其批评文章中尖锐的质问——“这真的是工人么？”即路翎小说的“工人的知识分子化”问题。

在胡绳看来，无论路翎“所写的是是什么矿工，但所反映了的却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心情”，是“硬要把本来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东西装到工人的心里面”，并认为其根源在于作家“太强的知识分子的主观”妨碍了对“实在的工人生活”的把握^[4]。应当说，在考虑到胡风及《七月》同人反抗客观主义倾向的理论前提之下，胡绳对路翎小说做出的这一分析与判断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问题恐怕并非如此简单。据路翎回忆，针对同样的问题，胡风当时还向他转达过向林冰的意见，认为路翎“写的工人，衣服是工人，面孔、灵魂却是小资产阶级”，并且有着“精神上的歇斯底里”；并认为小说人物的语言是“不尊重事实”的表现，“人物缺少或没有大众的言语，大众语言

的优美性就被你摒弃了”^{[8](P.5)}。然而路翎对此却有自己的认识：

不应该从外表与外表的多来量取典型，是要从内容和其中的尖锐性来看。工农劳动者，他们的内心里面是有着各种的知识语言，不土语的，但因为羞怯，因为说出来费力，和因为这是“上流人”的语言，所以便很少说了。我说，他们是闷在心里用这思想的，而且有时也说出来的。我曾偷听两矿工谈话，与一对矿工夫妇谈话，激昂起来，不回避的时候，他们有这些词汇的。有“灵魂”、“心灵”、“愉快”、“苦恼”等词汇，而且还会冒出“事实性质”等词汇，而不是只说“事情”、“实质”的。当然，这种情况不很多，知识少当然是原因，但我，作为作者，是既承认他们有精神奴役的创伤，也承认他们精神上的奋斗，反抗这种精神奴役创伤。^{[8](P.5-6)}

在此基础上，路翎更进一步提出：“精神奴役创伤也有语言奴役创伤，反抗便是趋向知识的语言”。而造成这种“语言奴役创伤”的另一个社会根源在于：“上层的流氓，把头，地痞性的小官和恶霸地主，许多是用土语行帮语，不用知识的语言，还以土语行帮语为骄傲；而工农不准说他们的土语，就被迫说成相反的了。劳动人民他们还由于反抗有时自发地说着知识的语言。”^{[8](P.5-6)}

虽然我们无法证实，路翎对于劳动人民的“知识语言”和“语言奴役创伤”的发现，究竟是来源于现实观察，还是出于一种理论的臆造，就连路翎自己也承认“我还是浪漫派，将萌芽的事物‘夸张’了一点”^{[8](P.5)}。但真正重要的是，“语言”背后的权力宰制关系，以及反抗这种宰制的可能。在这里，路翎将语言分为“外表的”与“内心的”，无法说出并不等于内心没有。可能是在高尔基的影响下，路翎笔下底层人物的话语的确常常流露出知识分子的特征。托尔斯泰就曾对高尔基小说中的人物语言批评道，“您的那些农人讲话都是太雅了”，并认为现实中的农民说话都是愚蠢（或故作愚蠢）、次序颠倒而不知所谓的^{[9](P.22-23)}。关于这一点，胡风曾在给路翎的信中表示：“托尔斯泰对老高说的话不全对。老高底人物所说的话，是他们可以说的，至少是想说的，问题是看他是否通过了活的语言、表现方式。要发掘隐藏着

的东西呀”^{[8](P.13)}。在上述关于“语言奴役创伤”的论述中,路翎正是在努力发掘底层工农心中“想说的”、“隐藏着的东西”。对路翎而言,语言并不单纯是语言,而是与自我意识、情感能力甚至思想能力相关联的;而所谓的“知识语言”恰恰指向一种高度的自我意识与反思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当劳动人民“自发地”说出“知识语言”,正意味着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于那种垄断知识语言的社会权力结构的反抗。而那些人物无法说出的、精神上的“唐突与痉挛”^{[8](P.6)},则是底层劳动者还处在“前语言状态”之中的内心的反抗。或许正是出于对这种“自发性”反抗的信心,路翎才会一方面让这些底层劳动者艰难地、尝试性地说出了那些不属于自己的“知识语言”;而另一方面,路翎对于工农精神世界的发掘、对“唐突与痉挛”的表现,则是通过叙事者的“知识语言”,说出了底层劳动者无法说出的内心。因此,路翎的写作其实提出的是一个底层人民能否发声以及如何发声的问题。路翎笔下的工农形象虽然在一种“从外表量取典型”的真实观下缺乏可信性,却无疑提出了这样一种颇具革命性的假设:复杂的心理结构、主观体验与精神意志,或者说某种内在的“深度自我”,并不一定是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及其文学形象的专利,而是可以在反抗中获得的。

事实上,早在1940年初涉矿工题材时,路翎对于“工人的知识分子化”问题就已有自觉:“我很苦恼不能正确知道现在一个进步的工人是怎样的在生长。而在较落后的这里又该怎样?我几乎把一个工人写成知识分子甚至‘诗人(?)’地在出现着。”^{[11](P.17)}在路翎的“苦恼”中我们可以发现,语言问题与心理问题在根本上都是与工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发展相关联的。但或许也正是因此,路翎的人物总是缺乏行动,小说最大的动作性往往都发生在人物的精神世界,并进一步向外在世界扩张蔓延,这使得路翎对于客观物象的状写也总是充满了体验性、精神性的形容词。由此,精神上的动作与意志的斗争,似乎成为了某种革命意识的源泉。然而在处理“一个进步的工人是怎样的在生长”的问题上,路翎的苦恼与他进一步的写作实践还是提出了这样一个有关革命的“自发性”的问题:在落后的社会现实中,底层劳动者将

如何自发地萌生自我意识、产生革命自觉,并进一步升华为有效的政治力量呢?

二、底层劳动者如何觉醒?

作为一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胡风其实是有意将路翎笔下的“人”的图景纳入到自己有关“原始的强力”及“主观战斗精神”的论述框架之中,然而路翎的写作实际上要比胡风的阐释复杂得多。在路翎关于“郭素娥”的自我表白中,除了“人民底原始的强力,个性底积极解放”之外,还有为胡风在其序言中并不认同的后半段:“但我也许迷惑于强悍,蒙住了古国的根本的一面,象在鲁迅先生的作品里所显现的。我只是竭力扰动,想在作品里‘革’生活的‘命’。事实也许并不如此——‘郭素娥’会沉下去,暂时地又转成卖淫的麻木,自私的昏倦。”^{[11](P.45)}路翎对于劳动者自我觉醒之可能性的挖掘,并没有使其落入到没有边际的浪漫主义或过分乐观的公式主义当中去。相反,路翎的复杂性正在于他在挖掘“人民底原始的强力”的同时,也写出了劳动者走向自我觉醒的曲折与艰难。在小说《卸煤台下》中,运煤工人许小东最初表现为一种“被压抑的儿童和辛苦的成人底某种奇异的混合”,一边默默地承受着工头的压迫,一边固执地留恋着家乡的佃农生活。路翎共使用了11次以“儿童”为喻体的修辞刻画这种无知的蒙昧状态。然而这一麻木昏聩的精神状况却在“偷锅”事件这一巨大的创伤体验中开始松动:

在内心底黑暗里浮沉,磨苦于儿童式的恐怖,痛苦,妒忌,怨恨,最后又变得无力,归于糊涂。但在一切这样盲目的时候,虽然他错综的心理意味自己会被某种力量抛弃,某种力量还在支撑着他,而且愈来愈强,这便是孙其银和伙伴们底坚强的友谊。

他渐渐能在心里接近这个东西了。有一个瞬间,他对一切也盲目的怨恨,想要也推开他,但却动不了。^②

许小东开始在朦胧中获得一种“大家都穷,大家帮忙呐”的群体认同与归属感,甚至开始重新审视那个“呆板的回乡梦”,并终于在孙其银、老工人方正基的启发以及一种集体生活的氛围中,喊出了“我要做人!”的呐喊声。然而这觉醒却并不持久,也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正如路翎的大部分小说一样,

许小东还是迎来了一个悲剧性的结局:在被工头解雇并摔断了一条腿之后,许小东堕入了疯狂,在孙其银离开之后,他只能像一个幽灵一样无望地重复着“大家就要好了”的信念。从蒙昧到觉醒,再从觉醒的无力到彻底的疯癫,路翎笔下的劳动者形象对于公式化的左翼文学写作中一蹴而就的觉醒与反抗而言,无疑是另类的:像许小东一样,他们是一些满负着精神奴役创伤、常常被精神的扩张折磨得歇斯底里而又无法言说,在走向觉醒的道路上充满曲折与反复,犹疑的、动摇的、软弱的、昏倦的、从卑下中跃起而又跌入死寂的、缺乏行动的劳动者形象。与主流革命文学中常见的那种鲜明、单纯、坚定的劳动者—暴力革命者形象相比,路翎小说的主人公身上承载了过多的甚至有些超负荷的具体性与动态感。这种强烈的异质性对于劳动人民必将走向觉醒、获得解放的必然性观念形成了某种质疑,至少是揭示出了这一由“自在”走向“自为”之过程的复杂性与艰难程度。瞿秋白在批评30年代左翼文学中一部分表现工农和下层劳动者觉醒的作品时,曾特别注重引导作家深入认识人物心灵更复杂的层面。他指出仅仅看到和描写劳动者的转变或觉醒的行动是不够的。现实中,他们的心灵更多的是被扭曲得“奇形怪状”,或者“形式上变换一个样子,而奴隶根性仍旧保留着”,“奴隶的心的变化和取消,是极端复杂的景象和过程。群众所需要的文艺,还应当更深刻些去反映,更紧张些去影响‘挖心’的斗争”^{[10](P.409-411)}。而为瞿秋白所期望的这种能够反映现实复杂性的“文艺的复杂表现”,可以说在路翎这里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实现。路翎对这种现实复杂性的开掘与坚持,也传达出了七月派作家反对“抽象理解现实”的一种共同信念,即历史真实是非观念性的、具体的、复杂的并与现实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然而即使不是在与主流写作模式具体对抗的意义上,这种观念也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步观及其神话诗学倾向之间存在分歧。

胡风曾在书信中多次向路翎表示,希望他能加强人物的“自觉性”和“进步性”——“他觉得在现在中国文学里,工人的形象非常的需要,中国的有政治自觉的工人早就产生了。”读过《卸煤台下》之后,胡

风就提醒路翎“还要注意工人自觉性的描写”,“里面有党的活动的暗示性的描写,是很好的,但有几个工人,譬如老工人方正基的自觉性,人群的力量,就还可以加强”^{[8](P.16)}。这显然与胡风对于人民大众“自在的自觉”的强调有关。正如王丽丽在其胡风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对人民热情和力量的吁求,到民族形式问题讨论对大众欣赏潜力的激发,再到主观论争中对解放的进步要求的强调,人民大众的觉醒和主动性的发扬都是胡风思考不变的基点。”^{[11](P.137)}然而路翎笔下的人物一方面过于依赖内在自我与精神扩张,而没有显示出对于其他外部力量的依赖;另一方面又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与丁玲、张天翼、叶紫、沙汀、吴组缃等左翼作家作品中集体性的暴力革命不同,路翎笔下的反抗行动仍以个人行动居多,继起的集体形象则往往表现为某种象征性的诗化形象,被模糊化与抽象化;而其反抗的动机也还停留在原始的复仇情绪,以及对于作为领导者的进步工人之个人魅力的崇拜与拥护之中。

如果仔细分析胡绳的批评我们会发现,胡绳虽然否定路翎的心理描写,却并不否定路翎对工人生活实景的把握;胡绳对于工人心理之“小资产阶级性”的批评实则是在否定底层劳动者拥有内在个人与深度自我的可能。在胡绳看来,这种具有内在自我的精神动能是不具备现实性与能动性的,他认为路翎“所看到的人民力量不是从现实生活中产生,倒是建立在与现实生活无干的突发的感情波动之上,也不是在集体的群众中产生,倒是建立在离开群众的独立特行的个别人物身上”^[4]。换言之,胡绳批评的核心问题其实在于:真正的历史主体到底应当是个人性的还是集体性的?应当说,胡绳敏锐地辨认出了路翎小说中“个性底积极解放”这一主题及其劳动者形象中潜在的个人主义倾向。但在胡风那里,“人民”的概念其实来自于对“五四”文学中“人”的观念的继承与改造。胡风认为,“人民”在历史上要经过三个阶段,即从“被当做千人一面的劳动机械”,到被承认为“各有个性的生命”,再到“各有个性的生命得到最大的开花”,“终于要汇成为共同的命运而斗争的集体的力量”,其内在的逻辑是人民要从消极

的、被动的、潜在的历史主体逐渐成为积极的、主动的、真实的历史主体。但是在中国,人民“还没有脱出‘无非张三李四’的第一个阶段”,还没有获得普遍的“人”的意识与个性意识^{[12](P.427-429)}。由此可见,胡风的“人民”概念从最初的觉醒到最终的价值归属都在于生命的“个性”,而非集体意义上的“阶级性”。应当说,路翎致力于书写的正是人民从精神上奋起、以获得个性意识的“第一个阶段”。因而在路翎的小说中,劳动者之朦胧产生的阶级认同与对“群”的需要,也是建立在个人觉醒与“个性底积极解放”的基础之上的。质言之,在路翎这里,阶级的觉醒、集体力比多获得有效组织的第一步,恰恰是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现代主体的建立。这与胡风希望促成人民大众思想意识与思维方式的现代化,养成人民的“自动性,创造性,使他们能够解决问题,理解世界”,“从‘亚细亚的落后’(‘今天的状态’)脱出,接近而且获得现代的思维生活”^{[12](P.48)}诉求也是内在一致的。

三、战时工业内迁与非典型的革命主体

在叙事上首先选择“个人觉醒”还是“阶级觉醒”的问题,导致了路翎小说中“个”与“群”之间的悖论关系。路翎笔下的个人觉醒,其实在很多时候还是被放置在“群”的氛围中发生的。当许小东喊出“我要做人!”时,“沉默的大多数”也显示出了不可思议的伟力:

煤场上叫骂和歌声隐去了,煤场上寂静了,只听见斗车运动底单调的大声。凉风安闲地吹着,灯光澄清,坡路寂寞。斗车工们在笨拙而迟缓的爬行里是无声的,仿佛失去了希望,也不再仇恨。但雷霆从地下升起来,给予他们底人类的沉默以一种勇往直前的粗壮的旋律——一切都来自他们自身,他们合一,带着足够粉碎一切的力量艰苦地向前!

他们里面的一个,痛苦的许小东,惊喜地交付着他底力量,不,得到他底力量。卸煤台在脚下呻吟,山峰退避开去。他空空地望着前面的黑暗,但觉得什么都可以看见。

在他底生活里,他是从没有经验过这样的思虑,痛苦,失望,喜悦,焦渴,和觉醒的。^②

在这里,路翎揭示出的其实是个人觉醒(自我意识)与集体觉醒(阶级意识)之间互为依托的关系:只

有向集体“交付”出个人的力量,个人才可能真正“得到”自身的力量。但问题在于,在初步觉醒的劳动者那里,“个”与“群”的对立却产生了无法回避的矛盾。

在《饥饿的郭素娥》中,机器工人张振山身上强烈的个人主义气质,使他永远都无法成为主流左翼文学中典型的进步工人形象。而“这种‘个人的英雄主义’在作品里,应该怎样处置”^{[11](P.40)}的问题始终困扰着路翎。张振山强烈的自我意识表现为一种“暗辩体”式的自我反省:人物强烈地要求更进一步地认识自己,认识他人对自己的认识,认识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群体的关系。在这一频繁发生的自省中,张振山在自我否定的同时,虽然明知阶级团结的重要性,但又恐惧于在阶级革命内部,群体对个体可能构成的压抑,因而他既有对于“强烈的公众生活的愿望”,又有一种“生怕会贬抑自己的个性的芒刺的疑虑”:

我们不能放纵自己,要选取大家所走的路。……但性格又怎样解释呢?张振山何以成为张振山呢?我已经忍不住了!谁都在毁坏我们,我们还多么不自知。……哼,打击给他们看,社会造成了我,负责不在我!我要大步踏过去,要敲碎,要踢翻,要杀人……哦,我的头脑里就装满了这样的云!^{[13](P.44)}

在张振山身上,充满了这种对“群”的渴望与对个性的放任、集体利益与个人欲望之间的冲突及其带来的恐惧与怀疑,客观上这显然不利于阶级革命作为远景的确立。这使得路翎小说的意义图景充满了裂隙与不稳定性。对于张振山而言,这种个人主义倾向同时也是由他复杂的个人生命的前史造就的。这个做过报童、流浪儿、小侦探、机器工厂学徒、打过仗、坐过牢、受过刑、杀过人的机器工人身上层累着过于复杂的历史,工厂生涯带来的目标感、责任感与团结感在一种危险而混乱的都市生活中被屡屡打断,这使得张振山的气质变得更像是“一匹游荡在社会草原的孤独的狼”^{[13](P.8)},而难以成为一个进步的产业工人的典型。但这也恰恰说明了,所谓的“工人阶级”并非如主流左翼文学中所想象的那样,是某种可以被抽象化与同质化的社会力量的整体。

张振山并不是路翎笔下唯一的一个非典型的产业工人。在路翎小说中,工人群体内部的复杂性要远远超过其同质性。路翎在1940年11月给胡风的

信中写道：“我在找一些工人底类型，在笔记里录一些材料。”^{[1](P.28)}从现实观察到小说写作，路翎几乎是有意在寻找和发现工人的不同类型与来源，并对工人群体内部的差异性以及不同类型的工人之间的关系进行自觉的再现与分析。正如胡绳所观察到的那样，路翎笔下的工人“是分属于两种型的：一种是流浪汉气质的工人，一种是刚离开土地不久的农民气质的工人”^[4]。但具体情况可能更为复杂。路翎小说中的工人既有西南乡村的本地农民、流亡农民、失地农民、手工业者、散兵游勇、私人煤矿工人，又有随着大工业内迁而来的外来产业工人。《黑色子孙之一》中的农工金承德与老工人石二、年轻工人何连、由于信仰不同而发生械斗的湖南工人与河南工人，《家》中的东北锅炉工人金仁高与打游击的河南人，《卸煤台下》中当过铁匠、打过游击的孙其银、流浪汉唐述云、老工人方正基、从江西老家逃难来到重庆做推煤工人的佃农许小东，《饥饿的郭素娥》中的机器工人张振山、流浪汉吴新明、佃农出身的土木工人魏海清——这些工人来自于不同的地域，携带着不同的习惯、经验、观念与信仰，随着动荡的战事四处流徙，大大增加了工人群体构成的复杂性。而路翎的小说则是有意再现了这些不同类型的工人之间的情感关联与矛盾冲突。在这里，“工人阶级”不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同质化的整体，也无法简单地依靠某种想象中的“阶级认同”建构起一个本质化的阶级形象。虽然路翎在《卸煤台下》与《饥饿的郭素娥》中也曾书写过工人们在一起探讨“工人命运”与“真理”的集体生活场景，以及某种朦胧的阶级意识的诞生，但如何产生共同的革命倾向，将这一内部差异纷繁复杂的群体力量组织并升华为有效的政治力量，仍然是路翎小说中最大的现实性与远景性的难题。

值得注意的是，路翎对于不同工人类型的把握，尤其是对于“流浪汉”工人的塑造，未必完全如胡绳所言出自路翎的主观臆造或出于对现实斗争的逃避。事实上，工人群体构成的复杂面貌与这一“流浪汉”式的工人形象恰恰是根植于抗战时期中国工业大规模内迁的现实语境之中的。自1938至1942年，四川迅速成为战时中国大后方工业的中心、钢铁工业重心以及机器工业的主干。在抗战爆发之前，中

国工业与工人大多集中在上海、北平、天津、青岛、武汉、无锡等城市地区，而抗战的爆发、城市的沦陷打散了这种高度集中于大城市及东南沿海的工业格局，迁入四川的“工厂数目，工人人数及动力设备几皆占战时全国总数之一半”，重庆及其临近各地“厂数占全川总数三分之一”，成为了战时大后方工厂与工人最集中的工业区域^③。随着抗战初期大量的工厂内迁以及西南工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出现了一个相当庞大的介乎于手工业工人和产业工人之间的工人群体。其中，“新工人即第一代工人占了绝大多数”，并“主要来自当地的破产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还有从沦陷区逃亡出来的难民，以及因躲避兵役而拥进城市的乡村人口”^{[14](P.256)}。而这种复杂的出身和入厂的动机，也随之带来了严重的地域观念与行帮观念。路翎经常造访的后峰岩煤矿所属的天府煤矿公司，毗邻嘉陵江畔与北川铁路，运输便利，是当时嘉陵江各矿中月产量最高的矿业公司（见朱谦：《重庆市用煤之来源及其产销概况》，《西南实业通讯》，1940年第1卷第2期）。由于迁都以及大量工厂的迁入，重庆地方的燃料需求激增，为改良天府公司的旧法开采方式，自1938至1939年，河南焦作的中福煤矿与湖南湘潭煤矿先后将大批机械设备与技术工人迁入，经过多次合并、合作与改组，以实现工程方法的改进^④。路翎小说中的河南工人与湖南工人之间发生的械斗，正与天府煤矿复杂的人员构成、开采方法的差异以及激烈的地方文化冲突有关。与此同时，由于西南内地长期缺乏工业基础，国民政府在发动东南厂矿内迁与本地工业动员时，也大力发动技术工人内迁作为技术补充，其中以张振山这样的机器工人最受重视，同时还要在后方当地加紧训练车工、钳工、木工及铸工等新技工。然而，本就相对薄弱的技术工人、熟练工人也在不断发生分化。“这些技术工人，在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又往往有较深的社会阅历和较多的组织与斗争经验，本来应当为工人运动提供中坚力量”，然而前述这些复杂的现实问题却“使他们的这种使命感与实际作用大为降低了”^{[14](P.258)}。

由此可见，正是战争造成的工业迁徙与社会生活的双重不稳定性，使工人的流动性普遍增强了。伴随着战争这一巨大的现代性事件，暴力化的社会

流动使孙其银、张振山这样的工人被迫切断了地缘、亲缘、家族或家庭等一切乡土中国意义上的社会联结,作为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孤绝的个人被抛入了充满变动的现代情境当中。路翎对于“流浪汉”工人形象的发掘,恰恰是在底层劳动者身上找到了一种现代主体形象的原型,也正是在战时工业内迁这一现代性的社会流动中,路翎笔下的工人形象才获得了其现实性与差异性。

结语

与30年代书写工人革命的左翼文学模式相比,路翎40年代小说中有所争议的劳动者形象不仅包孕着一种非典型的革命主体诞生的可能,揭示出“工人阶级”这一政治主体想象内在的复杂性与现实性,更显示出40年代的战争经验尤其是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对于工农群体的内部构成、经验方式及主体意识的重构。战争带来的流亡以及战时工业向大后方的迁徙,打破了之前城市与乡村之间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以一种暴力方式将中国工农强行卷入到现代进程中去。在路翎这部分书写西南矿工的小说中,除了非典型的革命主体形象,我们还可以看到外来工农在进入西南地方时携带的流亡经验、乡土记忆与地方文化印记,以及由此引发的个体悲剧乃至群体性冲突,也可以看到战时工业内迁对于西南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地方风俗酷烈的入侵与更动,以及西南本土农工的激烈抵抗。流亡难民和失地农民的工人化带来的是一种中国式的“农工”经验。与30年代以产业工人与城市革命为主的左翼文学不同,路翎的小说打开了一个介于城市与乡村、工人与农民之间具有流动性和复杂性的观照视野,以一种细腻而深刻的方式展现了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导致的产业结构与社会性质转型过程中的微观经验。今天对于革命与战争的重新理解,亦有赖于这些新的经验视野的打开,这也是我们在战时工业视域下观察路翎40年代小说创作的意义所在。

注释:

①路翎晚年在总结自己的文学资源时特别提到,抗战开始时他开始阅读苏联文学作品,其中,“高尔基的《在人间》、《草原故事》、《下层》,是使我感动的文学读物,影响了我的世

界观”;“在我的后来的作品里,描写下层人民,也相当多地描写流浪汉,其中的美学观点和感情、要求,多少受着高尔基的影响。”参见路翎:《我与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2期。

②路翎:《卸煤台下》,《抗战文艺》第9卷第5、6期合刊,1944年12月。该小说引文皆出于此。

③参见《抗战时期四川与重庆的工业概况》(1948年),傅润华、汤灼生主编:《中国工商要览》,中国工商年鉴编纂社,1948年。

④参见《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协助和筹设内地工厂情形的报告》(1938年12月),《抗战时期的天府煤矿公司》(1947年12月),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合编:《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工业》,重庆出版社,2014年12月,第6、528、532页。

参考文献:

- [1]路翎,路翎致胡风书信全编[M].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
- [2]胡风,胡风路翎文学书简[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 [3]胡风. 饥饿的郭素娥 蜗牛在荆棘上[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 [4]胡绳. 评路翎的短篇小说[J]. 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1948(3).
- [5]怀潮(阿垅). 论艺术与政治[A]/蚂蚁小集(第4辑)[C]. 蚂蚁社编印,1948.
- [6]路翎. 何绍德被捕了[J]. 七月,1941(4).
- [7]舒允中,内线号手:七月派的战时文学活动[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
- [8]路翎. 我与胡风(代序)[A]/胡风路翎文学书简[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 [9]高尔基,回忆托尔斯泰[M]. 巴金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4.
- [10]瞿秋白. 财神与反财神? [A]/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一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 [11]王丽丽,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12]胡风,半仑村断想[A]/胡风评论集(中册)[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13][美]乔治·埃尔顿·梅奥,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M]. 时勘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 [14]齐武. 中国工人运动史第五卷抗日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